

## 导 论

# 大和民族的崛起与中国文化

所谓文化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反映着人类控制自然界和社会自发力量的程度。物质文化也好，精神文化也好，都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化。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是或先或后，或快或慢。又由于各民族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自然环境、心理状态等的不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反映着本民族的生活、历史和风俗等特点，非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日本与其他民族一样有其独特的文化，且这种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别的民族有所不同，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后形成的。

在日本，关于日本文化的起源、系统和发展诸问题，向来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至少自绳纹文化（新石器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已经居住在日本列岛而创造出自己的固有文化；另一种认为绳纹文化以来，有各种异质文化的种族渡海来到日本而形成重叠的混合文化。前者主张新文化的出现是由于内在力量发展的结果，后者除认定内在因素和作用外，强调了外来因素的重要性。

主张内在因素为日本文化发展的原动力的一派学说以长谷部言人、直良信夫和铃木尚等为代表，他们把弥生时代（金石并用时

代)以前的日本人称为先史日本人,把古坟时代(铁器时代)以后的日本人称为现代日本人。他们根据已发现的骨化石进行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旧石器前期尚在研究中之外,旧石器中期以后各时代的形质变化只是因生活条件及极微的混血而变动的小变异,日本人一贯是同一人种。〔1〕

主张外来因素为日本文化发展的原动力的一派学说以清野谦次和冈田雄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由好几个种族混合而成的,现代日本人主要是从大陆和南洋来的各人种的混血种。从而“日本文化是以所谓固有文化为基础,经过中国文化、佛教文化、欧美文化的积累、混交或同时并存而形成的一种混合积累文化。再者所谓固有文化也已是经由好几个阶段异质异系的种族文化后形成的多元性文化构造”〔2〕。

在日本,这两派学说各有其信徒,迄今不能断言谁是谁非。战后由于城市建设的扩大和日本考古学的发达,自1949年岩宿遗址〔3〕发现以来,全日本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近1000处,特别是日本原人骨化石,自战前(1931年)明石原人发现以来已达7处之多。〔4〕这些考古学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是在日本列岛土生土长的,日本文化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其他民族渡海到日本后创造的。冈田雄则主张日本固有文化是在从南中国、江南地区、印尼方面渡来的几种农耕文化色彩很浓的地盘上,再覆盖统治者文化后的混合文化。他还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和东北扶余、高句丽相类似的种族,是从三四世纪起经朝鲜半岛南部而到达日本

〔1〕 樋口清之《日本人之祖先》第19页,每日新闻社,1978。

〔2〕 冈田雄《日本文化的基础构造》第18页,言从社,1979。

〔3〕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桐生市西南约4公里的岩宿,1949年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开始发掘。

〔4〕 日本原人骨化石计有明石原人、葛生原人、滨北原人、牛川原人、帝释观音堂原人、圣岳原人、三日原人。

的。他说：“天皇种族几时来到日本列岛不清楚，但公元 4 世纪在大和成立王朝国家是很清楚的。当时日本列岛各地住着几种母系或父系的定居农耕种族和捕鱼种族，天皇种族渐次征服这些种族而扩大国家领域，慢慢形成广大的社会，诸种族逐渐丧失各自的种族独立性而成为国家社会内的农民和渔民，形成下层社会。诸种族的固有文化互相接触、混合和混血，种族意识渐渐失去，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文化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的日本民族成立了。”〔1〕台湾徐松石推定伊奘诺尊（日本神话中的日本人的创造者）就是伏羲氏，天忍穗大耳尊（素戔鸣尊在天河上递玉给天照大神而生的儿子）就是神农氏，大和民族就是神农氏的后裔。他在《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无论如何，出云贺茂族和天孙民族都是由中国移去的，这一点可无疑义。出云贺茂族属于通古斯种，天孙民族属于（中国）越民族。”〔2〕

总之，他们都强调了日本文化中存在的南方要素（如水稻栽培，铜镜中的象、狮等南方热带动物图案等）和北方要素（如梳齿纹陶器，马的殉葬，大量马具的出土等），从比较民族学的立场得出结论的。从比较丰富的考古资料来看，日本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乃至古坟时代，并没有东西可以表明来自大陆的侵略和为了征服异民族而大举渡海来到日本之类所产生的现象，倒是表现出从大陆带到北九州的先进文化被接受，渡海而来的异民族被同化。而且这种先进文化又经北九州向东扩散，促进了绳纹时代日本人全部弥生化。如果把先进文化的传来看成是异民族的征服，从而在原有文化的地盘上“覆盖着统治者的文化”，那便否定了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和历史联系。再者，日本离朝鲜最近的距离是 120 海里，与

〔1〕 冈田雄《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和日本国家的形成》，第 46 页，吉川弘文馆。

〔2〕 徐松石《日本民族的渊源》第 31 页，香港东南亚研究丛书第一种《远东民族史研究》第 4 册，1966。

中国相隔最近的距离是 460 海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即使能像挪威人海尔达那样用木筏渡海〔1〕也只能是少数，何况日本人口在绳纹时代已有 75 万至 140 万，在弥生时代达到 400 万〔2〕。要渡海去征服这么多人是不可想象的。

文化的发展不是外部力量所能强加的，它只能依靠内部力量逐渐进展。文化这个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的，什么样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它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全世界所有人类，严格地说纯种是不存在的，所有民族都是由好几个种族混合而成的。如意大利民族来自伊特刺斯坎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法兰西民族来自高卢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所以日本人是混合种也不例外。正如樋口清之总结前人的研究所说：“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华南洪积期（数十万年以前）化石人类有关系的化石日本人为核心，并且还渐次加入南方的马来人、印度支那人，北方的通古斯人、阿伊努人等，结果产生出尚未完全融合的现代日本人。”〔3〕我们认为，这样既不强调日本文化中的外来复合要素，又不忽视外来要素的重要性。日本文化是日本人摄取大量外国先进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后，经过长期历史演进而在日本列岛这个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其形成的母胎要上溯到无土器文化即旧石器时代的先史日本人。

日本古代历史的发展比当时的先进国家要迟缓得多。公元前，日本还处于新石器时代，中国却已进入铁器时代，建成强大的封建帝国——汉朝。而在西方，如希腊、罗马等也早已建成发达的

〔1〕 挪威人海尔达为证实古代文化能够渡海传播，1947 年以九根圆木组成木筏，命名“太阳神号”从秘鲁的卡亚俄港出发，经 101 天，漂流 430 海里而到达波利尼西亚。1970 年乘第二艘“太阳神”号“芦苇船”从非洲出发，航程 3270 海里而到达大西洋彼岸。

〔2〕 根据《世界美术》第十六卷（世界文化社编，东京，1980）中的统计数字。

〔3〕 樋口清之《日本人之祖先》第 39 页，东京每日新闻社，1978。

奴隶制国家了。日本和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古老国家相比，农业的出现晚了好几千年，青铜和铁的使用也晚了几个世纪。因而日本必须急起直追，向先进国家特别是向中国学习，建立起本民族的文化，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

日本始终把文化上的借鉴作为他们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平安前期（794—894）的日本史，可以说就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历史。日本在引进外国先进东西这一方面是很独特而出色的。日本人的突出之处，与其说是模仿性，毋宁说是独创性，以及他们在学习和应用先进经验时不失去固有文化特征的才能。

当一个后进国要学习先进国的文化时，并不是完全肃清自己的固有文化之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新文化来的，而是在其固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日本在摄取先进的中国文化时，与其固有文化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文化，如假名的发明，大和绘的产生，佛教的日本化等。这种混合文化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的特点，如日本建筑典雅简素，线条明快，与装饰华丽、色彩夺目的中国建筑迥然不同。文化的民族特点构成民族文化的个性，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成为世界性的。凡不与本民族固有文化有机结合仅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外国的东西的，那么这种文化是僵死的、无生命的，也就不能成为世界性的。

在古代，日本在中国文化狂澜的冲击下，没有被同化，相反地以中国文化为骨干，以固有文化为血肉，构成了一种与中国、朝鲜相异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在近代，又在“东洋道德西洋艺”的口号下相当成功地摄取了大量西方文化。与此同时，又牢固地保持着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以及保存在这些特征中的中国文化因子。“西欧与日本之间有着显著的类似性，尽管如此，还存在着根本不得否定的相异性。”〔1〕日本没有真正把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督教文化吸

〔1〕 林健太郎《西欧与日本》第6页，新潮社。

收过去，基督教在日本没有广泛传播。尽管由于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而在某些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古老的大陆文化传统始终没有变动。“日本融合东洋西洋文化，但又不失其固有之精华，从国外借用来的东西全然为我所有，从外国输入的东西恰如固有一样。这是日本文化的特色。”〔1〕我们可以把这个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看成是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日本文化的发展受交通的影响，与中国交通的是否便利直接影响日本文化的成长。由于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古代历史的后进性，日本必须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学习，摄取先进的文化，改造落后的社会。这就使先进的中国文化得以向日本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靠人和书籍的交流来实现的，所以说两国间交通的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势头。日本与大陆的交通越频繁，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就越丰盛，给日本的影响也越深刻，这点从日本先后任命 19 次遣唐使一事可以证实。那时日本文化正在全面模仿唐朝，举国上下掀起一个学唐的运动，中国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日本，使日本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点。

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全方位的，而且是贯穿整个日本古代史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热衷于对中国文化的摄取。我们姑且不说日本的化石人是华南化石人的一支，是从中国移去的（那时日本列岛还和大陆连在一起），即使从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日本旧石器时代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了。后经弥生（金石并用）时代到古坟（铁器）时代其影响逐渐加深。大化改新成功后建立起来的日本古代律令制早期封建国家，就是以中国的封建王朝隋唐为模式的。其后至奈良时代（710—784）这个时代的白凤、天平文化就是盛唐文化的移植。当时全日本掀起了一个学习中

〔1〕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一卷，春秋社，1953。

国的热潮，日本文化全面模仿唐朝，促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摄取。至平安后期（894—1192）由于唐帝国的瓦解，作为唐文化之一环的日本文化开始逐步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模仿到创新，然后从中国模式中脱胎出来，终于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即所谓国风文化。但这种文化是孤立的、局限的，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贵族文化。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日本的封建化是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为模式而进行的。当它脱离中国模式而独立创造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时，标志着日本封建化的完成，从以自由农民为主要生产力的早期封建社会（645—1192）进入了以农奴为主要生产力的中期封建社会（1192—1603，包括镰仓、南北朝、室町、战国、安土桃山诸时代），封建割据取代了中央集权，王朝贵族没落，武士阶级兴起，实权由中央移到地方，地方文化开始发达起来。新兴的武士阶级需要自己的文化，于是又积极地摄取宋、元、明文化，促成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摄取。当时皇权旁落，战争不断，人们为了超脱人间痛苦而追求宗教信仰，禅宗和净土教特别盛行，对日本人的思想影响很大，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要素的武士道却渊源于中国的禅宗和朱子学，而一向认为是日本特有的优美简素、高雅清淡之美学观，也是受中国净土教的影响。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禅宗传入日本，依附禅宗的朱子学也随之而来，成为日本近代儒学的渊源，对近代日本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至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进入后期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手工业、商业发达起来，城市兴起，产生了市民（町人）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也需要自己的文化，同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更需要适合自己统治的思想和文化，于是摄取明清文化，独尊儒学，促成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大摄取。朱子学的流行及其日本化，促进了日本学术思想（阳明学、古学、国学、史学和考证学等）的发达。同时朱子学作为一种实学，主张追求知识，吸取文化遗产，助长了兰学（从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发达；从中国间接摄取西方科学文化，开辟了西方文化传

入日本的捷径。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给幕末的尊王攘夷思想和勤王思想的影响很大，成为推翻幕府封建统治而建立明治维新政权的一大思想武器。不仅如此，朱子学（儒学）的影响还远及明治维新以后，对日本近代化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称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

至于日本摄取中国文化的范围和内容，则广大丰富，无所不包，无论社会思想、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只要对自己有用的，都成为摄取对象，真可谓“巧引中国五色线，织出日本斑斓锦”。

##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东渐

### 第一节 东渐的路线

日本文化很早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文化的发生期即旧石器时代（无土器文化时代）就接受中国的先进文化了。旧石器时代中国文化通过以下四条路线进入日本。

第一条：北海道路线。从西伯利亚沿海地方经库页岛进入北海道。

第二条：朝鲜路线。那时日本列岛和朝鲜相连，朝鲜海峡不存在。它是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朝鲜和欧亚大陆系统文化传入的路线。

第三条：东中国海路线，即从中国长江口到日本九州的路线。根据长谷部言人博士的研究，化石日本原人的发祥地在华南，所以这条路线也是日本人种移来之路线，同时也是水稻和三角边缘神兽镜传入之路。

第四条：冲绳路线，即所谓黑潮之路。南方文化经冲绳到达九州。

其中朝鲜路线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文化输入日本的最主要的道路。当朝鲜海峡出现而使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分开之后，主要靠所谓日本海环流路即黑潮之路传入大陆文化。日本海流是发源于台湾东面的暖流，其一部分流入东中国海，主流沿日本西南

诸岛北上。主流又分成两个支流：一个支流叫做西朝鲜海流，入黄海；另一个支流向东前进，成为对马海流而入日本海。这对马海流在五岛之西也分成两股：一股入朝鲜海峡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北上，叫做东朝鲜海流；另一股则经对马海峡沿里日本海继续北上。

这个东朝鲜海流的支流到达对马北端地方向东迂回，在对马的下岛大约北纬 34 度 15 分之线南下，在那里并入对马海流的主流之后，再继续东进，撞于岛根半岛。这个东朝鲜海流的另一个北支流向对马北方一路东进，一面擦过岛根半岛，一面北上继续东进而达能登半岛。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釜山附近曾有两艘装满大豆的船，五天后一艘漂到山口县的仙崎，一艘漂到鸟取县的赤崎。所以古代人乘独木舟沿着这条半漂流的航道渡海峡，能够到山阴（日本八道之一，包括丹后、丹波、但马、因幡、隐岐等地方）北陆（日本八道之一，包括新潟、石川、富山、福井四县）登陆，而且登陆地点不是在九州，而是在从岛根半岛东面的若狭湾到能登半岛的沿岸一带。流水纹铜铎多数在山阴、北陆及畿内一带出土，证实了这条航线。另外由山阴沿岸西进，到九州的西岸国岛附近乘东朝鲜海流去朝鲜半岛也是可能的。

由于日本考古学的发达，这条日本与朝鲜的原始航线得到证实。朝鲜釜山市绝影岛东三洞贝冢、同岛瀛仙町贝冢出土的梳齿纹土器与九州绳纹式文化早期的曾畑式土器（熊本县山西村桑鹤出土，形状像深钵）有关。东三洞贝冢出土的细带隆起纹土器给九州的轰式土器（熊本县宇土町轰贝冢出土）以影响。东三洞贝冢上层部还发现了绳纹式土器碎片和用日本佐贺县腰岳出的黑曜石制作的石镰等。这就证实了日本人也利用这条海流渡海到朝鲜去进行文化交流。

当初原始人使用像千叶县丸山町加茂发现的那种独木舟渡海，后来能造出较大的船（如奈良田原本町的唐古遗址附近出土的砖刻船，藏于奈良学艺大学）的时候，航线向西移动，即从朝鲜的弃

韩、辰韩地区经过对马、远岛（冲之岛）中瀛大岛到达筑前的胸形（筑前国宗象郡）。北九州发现的大量铜剑、铜铤中以博多湾为最多，证实了这是一条大陆文化传入日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近的航线。

## 第二节 弥生文化与大陆文化

### 1. 弥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日本的石器时代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所谓无土器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其基本特征是使用打制石器，还没有土器，生活的主要手段是狩猎和捕鱼。后期是所谓绳纹文化时代（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三百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其基本特征是采集经济（至末期才出现原始农业），使用土器和磨制石器，种类逐渐增多，居住建筑简单，有植物纤维、圆木舟和家犬，流行拔牙的风俗，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的阶段。这个绳纹文化时代于 100 多年前为一个外籍学者发现。

1877 年 6 月 18 日东京大学动物学教授美国人莫斯（Morse, Edward Sylvester 1838—1925）从横滨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透过车窗发现了大森区的贝冢，不久进行发掘。从大森贝塚出土的，以土器为主，还有首饰、骨针、骨角器、石器、人骨及大量贝壳。由于在土器上呈现绳索的纹样，因而叫做“绳纹土器”，这个时代叫做绳纹时代。大森贝冢的发现，揭开了日本原始时代的帷幕。

莫斯发现大森贝冢 7 年之后，由日本人自己发掘了弥生土器，揭开了日本金石并用时代——弥生时代的帷幕。1884 年 3 月 2 日，东京大学年轻的人类学者坪井正五郎、白井光太郎、有坂韶藏三人发掘调查了东京大学北侧根津谷（今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的山丘上的贝冢。除大量绳纹土器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壶形土器。它的形状比绳纹土器美，装饰极简单，而质料很薄，后来因其在弥

生町发现，被命名为“弥生式土器”。其后全国各地纷纷发现弥生式土器，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森本六尔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弄清了弥生式土器的时代是日本最早的农耕社会。

1936年和1943年先后发现了奈良唐古遗迹与静冈登吕遗迹（1949年正式有计划发掘），证实弥生时代是一个进行水稻耕作的金石并用时代。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上承绳纹时代（石器时代）下接古坟时代（铁器时代）。

弥生文化和绳纹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大约伊势湾沿岸以东即东日本的弥生土器，与该地区的晚期绳纹土器比较，烧成、土质、图案、整形法及部分器形相类似，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中部山区、南关东、仙台平原出土的弥生式土器，虽有显示个性的图案和器形，但与先行的晚期绳纹土器的地域色彩比较，大致是重复的。在西日本，以北九州为中心的板付式土器（一种前期弥生土器）往往与该地区晚期绳纹土器系统的夜臼式土器伴随出土，两者相比较，器形有明显差异，但成形、整形、技法、图案构思和施纹法、烧成法、土质等有一部分相同。所以即使在弥生土器的发祥地西日本，弥生土器也是在绳纹土器的传统上形成的，它作为生活用具，与生活有密切关系。虽然，弥生文化是在日本形成的文化，但弥生文化显然是经过大陆文化强烈影响，在昔日生活变革过程中诞生的文化。<sup>〔1〕</sup>

弥生文化从形成开始就具备水稻耕作、金属器、大陆系磨制石器、纺织技术等新的文化要素，显然是受大陆文化强烈影响。再者，我们若从弥生文化最初是在北九州形成，弥生时代初期流行的支石墓和南朝鲜的支石墓是同一系统，以及弥生时代前半期舶载的青铜利器也在朝鲜广泛出土等事实来看，新文化的直接移入途径是朝鲜，特别是一衣带水的南朝鲜。

〔1〕《日本历史》第一卷，第141—144页，岩波书店，1962。

弥生文化是农耕金属文化，水稻耕作这一新的生产形态是弥生时代人们的生活基础。金属的使用，促进了弥生文化的发达，也就是说，赋予弥生文化特征的各种要素都与农耕生活有关联，支持其存在，助长其发展。若具体举出其特征，则有如下几点：

(1) 弥生时代尽管还不能忽视狩猎、捕鱼的重要性，但水稻耕作已经成其经济基础。它已从利用低湿地的简单的前期水田经营，发展到投入大量劳动力建立人工灌溉设施的后期登吕型水田经营。

(2) 简朴划一的弥生式土器为土器生产的分工创造条件。又由于粮食的剩余，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共同体之间的分工有一定的发展。造船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与中国大陆文化的交流及国际分工，这点从族长阶层船载物资的丰富可以证明。

(3) 石制、土制纺锤及木制织机的出现（唐古、登吕等遗迹出土）以及男劳力集中于农业，使绳纹时代的性分工得以进一步强化。

(4) 青铜器（如作为祭器的铜矛、铜戈、铜剑和铜铎等）铁制工具及作为武器的铁剑、铁戈、铁镞等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个时代木制农具被广泛使用，石器至末期才被淘汰。

(5)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们确立了定居生活。又由于土地开垦、人口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多，使部分的阶级分化成为可能，终于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甚至像邪马台那样的雏型国家。

## 2. 大陆文化的要素

水稻究竟通过什么路线传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过去滨田耕作主张北来说，即中国 北朝鲜 南朝鲜 日本九州；柳田国男则主张南来说，即中国 南岛 九州。现在这些说法已成过去，从长江下游传到日本的东进说比较有说服力。东进说又分为直接渡来说和间接渡来说两种；前者认为是从长江下游直接传到

朝鲜和日本，为安藤广太郎所提倡；后者认为是从山东半岛一带经由朝鲜南部到达日本，为冈崎敬、坪井清足、佐藤敏也所提倡。直接东进说在考古学上的线索是石庖丁（一种类似石镰刀的摘稻穗的工具），因为九州发现的石庖丁与长江下游的石庖丁形状一致，但东亚使用石庖丁长达数千年，无法确定正确的时间幅度，不能压倒间接东进说。而且长江下游出土的古代米有日本型（粳米）和印度型（籼米）两种，若从中国直接传来，弥生时代的米也应当是粳籼两种，但北九州没有发现过印度型的籼米，不仅弥生初期，整个弥生期都是如此。<sup>〔1〕</sup> 这可以解释为印度型籼米传到朝鲜因不适应气候而枯死，只保存着日本型粳米。<sup>〔2〕</sup>

我们认为水稻从山东半岛经由朝鲜南部到达日本这条路线比较合理。据李江浙的《大费育稻考》<sup>〔3〕</sup>，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证明 5000 多年前该地已盛产稻米。再者：“日本之倭人本是中国大费禺京之倭人的移民及其后裔。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燕齐移民于朝鲜半岛以及燕昭王时远路由海上至燕都蓟城献‘龙膏’的海岛居民和久居朝鲜半岛东南端的燕齐移民及其后裔称‘秦韩’之事，可知经朝鲜南端海域通往日本的航路，在徐福以前很久便早已经开通。”<sup>〔4〕</sup> 这样看来，水稻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南部至日本是可能的。

大正九年（1920）在南朝鲜庆尚南道金海郡会岬里的金海贝冢第 7B 层发现了炭化米。<sup>〔5〕</sup> 这是南朝鲜有关水稻的考古资料。这粒炭化米现由九州大学农学部育种学教室保管。它的年代推定为公元 1 世纪，正当日本弥生中期。<sup>〔6〕</sup> 可见朝鲜水稻耕作在日本弥生

〔1〕 西谷正《古代日本和朝鲜——从考古学来看》第 102 页，学生社，1978。

〔2〕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一卷第 133 页，1975。

〔3〕 《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

〔4〕 李江浙《徐福东渡考》，《徐福研究》第 112 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

〔5〕 见滨田耕作、梅原未治《金海贝冢发掘报告》，1923。

〔6〕 同〔1〕。

时代就已进行，因而水稻从南朝鲜传入日本完全有了可能。再者，金海贝冢石棺群、瓮棺群北侧有变形支石墓（没有支石的支石墓），而北九州一带的变形支石墓也是和石棺、瓮棺在一起的，所以北九州的变形支石墓当然是随同水稻由南朝鲜传入日本的。〔1〕还有石庖丁，从弥生前期末到中期在北九州往往伴随板付式土器出土。这种石庖丁用辉绿凝灰岩制成，比较大型，从正反两面穿孔，其原型也可在朝鲜南部求得。不过朝鲜南部出土的石庖丁与华中的一样是割稻穗的，而日本弥生文化的石庖丁不仅割稻，还用以割大小麦等。再从其他磨制石器的配套来考虑，弥生前期的石器系统与其认为是华中的，不如认为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2〕

还有一个线索可能证明水稻经由朝鲜南部传入日本。南朝鲜釜山西郊发现的槐亭洞遗迹中有涂以丹彩的长体瓮形土器出土，把它称为槐亭洞Ⅰ式土器，而日本福冈县板付遗迹有一种夜臼式土器（最后的一种绳纹土器），与板付式土器（最早的一种弥生土器）一起出土。这种夜臼式土器的B型中有涂丹的长体瓮形土器，它与槐亭洞遗迹的瓮形土器一致。这种丹彩长形瓮，实在是运稻的容器。夜臼式土器不能理解为继承绳纹土器的传统，应考虑其为外来品。若夜臼式B型土器确由槐亭洞Ⅰ式土器移入，则槐亭洞Ⅰ文化就是日本农耕文化的母体。〔3〕再者，朝鲜半岛初期农业社会所使用的磨制石器（包括农具），在北九州弥生时代当初的石器群中也能看到，而这些同类的磨制石器绳纹时代完全不存在，故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明了。〔4〕

关于水稻传入的时间，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断定是在公元前3至2世纪左右传入北九州的。这点从弥生式土器附着稻粒痕迹

〔1〕 江上波夫、松本清张《古代朝鲜的文化和历史》第68页，读卖新闻社，1975。

〔2〕 西谷正《古代日本和朝鲜——从考古学来看》第104页。

〔3〕 杉原庄介《日本农耕社会的形成》第4—5页，吉川弘文馆，1987。

〔4〕 同上书。

和炭化米可以作证。稻传到日本大约 200—300 年后从北九州扩展到东北，后来波及东日本。当时的农业虽然以水稻为中心，在山区还是以旱地作物为主，如麦、粟、稗、豆、麻、桑等。日本最初是利用低湿土地进行自然灌溉，使用的是木制耕具，出现了一套水田操作程序：自然灌溉——湿田栽培——直播——摘穗。后来由于铁工具的使用和灌溉技术的进步，水田被大量开垦。

当初水田是由日本皇室经营的，耕作的人是从朝鲜带回来的俘虏和部民（强迫征集的农民）。后来由于水田的普及，人们便定居下来，在水田附近组成村落。战后发现的板付遗址和登吕遗址都是水稻耕作的村落。板付遗址的水田已很规划化，已有现代水田的雏形。据测算登吕遗址水田的收获量约为今天的一半。

水稻的传入不仅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是划时代的变革，使日本人从以狩猎、捕鱼为主的采集经济社会进入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经济社会。稻和铁的生产，促使日本原始共同体崩溃而出现了阶级社会，并进一步形成国家，而这种重大的变革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完成的。

中国殷、周时代青铜器文化发达，至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此时日本尚处于绳纹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先进的青铜器文化首先传到朝鲜，然后与水稻一起传入日本，产生了弥生文化。这里要注意的是虽然青铜器传入日本比铁器早，但日本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而是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所以青铜没有对朝鲜和日本产生有效的影响。

当初传入日本的青铜制品有铜镜、铜铎、铜戈、铜剑、货泉等，但这些都是非实用的。因为后来传入的铁作为利器比青铜优秀，所以青铜传入日本后没有广泛使用在生产上，大部分用于生产祭祀品和奢侈品。

据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 3 000 多面，其中的 1/3 是中国大陆制造的，因渡海而来，所以叫做“舶载镜”（中国镜），约 2/3

是日本制造的,叫做“倭镜”(模仿镜),在中国镜中,有前汉时代制造的重圈清白镜、重圈素纹镜、内行花纹清白镜、四乳雷纹镜等。这些镜的出土地方只限于北九州,是经朝鲜的乐浪郡传来的。后汉时代制造的方格规矩四神镜和内行花纹镜等,遍布全日本。三国时代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有 270 面以上。<sup>〔1〕</sup> 中国镜大量流入日本的背景是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真蕃、玄菟、临屯四郡,中国势力进入朝鲜,从而铜镜也随着到朝鲜的中国移民带到日本。

铜铎也是传入日本的铜器之一。它好像中国的编钟,上圆下扁,最大的有 168 厘米,最小的不到 30 厘米,其上铸有各种图案,如人物、鸟兽、房屋、流水等,周代的编钟是其祖型。铜铎是一种祭器,不实用。流行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 3 世纪,下限在公元 4 世纪。流行地区是畿内一带。1977 年宇佐市别府遗迹发现朝鲜式小铜铎(11.8 厘米)<sup>〔2〕</sup>,可见它是从朝鲜带来的。朝鲜的小铜铎高 9—14 厘米,共有 11 个遗迹,出土 35 个以上,分布于平壤附近及庆州一带。<sup>〔3〕</sup>

传入日本的青铜器中还有铜剑、铜戈、铜矛等,这些是在北九州一带的瓮棺中发现的,其来源地和其他金属器一样也是朝鲜。青铜武器都不是实用的,它是权力的象征,证明了族长权力的扩大和私有财产的增多。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发明铁,但还不普遍使用,直到汉代设置铁官 48 处,铁才被广泛使用。由于汉势力向朝鲜伸展,铁首先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比日本较早使用铁器和学会铁的冶炼,日本是通过朝鲜接受铁的。铁首先传到日本九州,九州福冈丝岛郡前原町前原樋沟遗址就是日本最早发现铁的地方。此外鹿儿岛县高桥遗迹出土

〔1〕 田中家《古镜》,东京讲谈社,1979。

〔2〕 贺川光夫《宇佐——大陆文化与日本古代史》,第 187—231 页,吉川弘文馆,1978。

〔3〕 同上书。